

# 非遗传拓技艺的发展及其当代应用

潘金杰

苏州碑刻博物馆 江苏 苏州 215000

**【摘要】**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，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。传拓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中的优秀代表之一，自汉魏以来经历千年，其技法也不断创新与完善，形成了系统成熟的传拓艺术。随着时代变革，传拓技艺的发展与传承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，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内核下创新内容、革新技术，是传拓技艺在新时代下的必经之路。

**【关键词】**：传拓；金石学；非遗技艺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5.07.012

## 前言

自商周以来，人类逐渐发展出成熟的文字系统。文字载体极为丰富，既有竹、木、帛、纸等作为日常书写材料，也有以庙堂、墓室等建筑墙壁为材料直接绘制，这些都留下以墨迹为主的手写体文字。另有一种特殊载体，借助金石为材料（金指以青铜器为主的金属铭刻，石主要指碑刻），将文字刻于其上，这就留下了现如今的金石文字。

传拓则是复制金石文字的一种古老技艺，通过纸、墨、刷子、拓包等工具材料将金石上的文字或图像复制到纸上。在古代，没有照相制版要如何复制各类文字，从保持文本原样和保持字形艺术的角度，传拓都成为了最适合且最便利的复制之术。传拓技艺的发明，也对金石文字的复制保存乃至后世金石学的发展影响巨大。

## 1 传拓的产生

司马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记载了秦始皇东巡时留下的六种刻石，北朝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中记录大约二百多种古刻，这些记载大多是在实物前现场记录或事后追述，并未提及“传拓”相关内容，可见当时虽已有碑刻，但传拓尚未流行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南朝梁元帝辑有《杂碑》二十二卷，碑文十五卷，在金石学界被称为“金石专著之祖”。施蛰存先生认为这些“梁朝遗留”都为拓本，不是影写，因此在南朝齐梁时期就应有纸墨拓碑。由此也便自然产生疑问：自东汉末年起，洛阳兴起碑刻石经，更有如“正始石经”等记载，而北朝确未有拓本流传，猜测因战乱等因素佚失，史书就此失载。

由此可见，传拓技艺的产生与兴起，首先源于大量金石文字的出现。

金石文字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墨子有云“著于竹帛，镂于金石”，可见当时文字的载体已有竹帛与金石之分，竹帛为真迹，金石则是铭刻文字。朱剑心在《金石学》中提及“三代有金而

无石，秦汉以下石盛而金衰”。先秦是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，依托青铜器为载体，其上铭文也不朽于世。宋仁宗曾下诏命秘阁和太常所藏的三代钟鼎器“付修太乐，所参较齐量”，又“诏墨款以赐宰执”。后来，丞相文彦博让国子监书学杨南中释读御赐的墨款钟鼎铭文，“以俟博古者”。杨南中于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将释读的钟鼎铭文撰成《皇祐三馆古器图》一书。又有刘敞将家藏十一件青铜器摹绘成图，刻于石板，名为《先秦古器图碑》。可见自宋以来，学者们开始关注先秦古器的研究，“金学”在宋真宗、宋仁宗年间活跃起来，同时也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“学术规范”。

先秦时刻文字传世相对较少，传石刻刻《石鼓文》看起来已有相当成熟的水平，说明其出现年代较晚。汉代刻碑之风盛行，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就其巡游所闻著录两汉石碑一百七十余件，宋代《隶释》收录汉代碑文115件，民国祝嘉从历代著录中辑录汉代碑刻七百余件，胡海帆先生的《秦汉刻石文字要目》收录汉代碑刻五百四十余种。其次，工具材料的不断进步完善，为传拓的产生提供了基础的物质支持。传拓所需的基础工具有纸、墨、拓包、刷子等，以纸墨最为关键。

新石器时期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矿物作为颜料，来绘制陶器等工艺品上的纹饰。至先秦，已有“邢夷制墨”的记载，且大量简牍、帛书的出土，也证明了墨在当时已有了广泛的使用。纸的出现要稍晚于墨，最早在西汉古墓中出土了植物纤维的麻纸，直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，采用更为常见的原料，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。也提升了造纸工艺，自此纸才得以广泛使用。且蔡伦改进后，纸张纤维具有了一定的伸缩性，这也使得它能够作为传拓材料进行使用。

## 2 传拓的发展

关于传拓技艺最早产生和运用的确切时间，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。

作者简介：潘金杰(1988.6-)男，江苏苏州人，本科，工艺美术师，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苏州碑刻技艺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，研究方向：苏州碑刻技艺。

而最早的拓本，出现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

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，皆蔡邕所书，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，相承以为七经正字。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，自洛阳徙于邺都，行至河阳，值岸崩，遂没于水，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，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车载入长安，置于秘书内省，议欲补缉立于国学，寻属隋乱，事遂寝废，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。贞观初，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，十不存一，其相承传拓之本，犹在秘府，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。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。

前文已经指出施蛰存先生的观点——即纸墨传拓出现在南朝齐梁时期，王国维在《宋代之金石学》中所述似乎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，“拓墨之法，始于六朝。始用之以拓汉魏石经，继之以拓秦刻石，至于唐代，此法大行。”迄今最早的传世拓本，便是唐太宗《温泉铭》手书碑刻拓本，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发现，为剪裱本，计48行，原石久佚，仅存拓本，此作品也是书法史上第一件行书碑刻。



图1 唐太宗《温泉铭》手书碑刻拓本

然唐代关于传拓的记载，不仅以拓本实物流传，在诗句中也多有记载。韩愈所谓“公从何处得纸本，毫发尽备无差讹”之句，体现了传拓技艺具有“复制”的功能，且从诗句中可以看出，至少在唐代，传拓技艺已经发展到十分高明的水准。唐代传拓大多以名家碑刻为主，大量金石文字还未进入大众的视野。

传拓技艺的发展及拓片的传播在宋代有了质的飞跃。自宋代起，金石学与传拓二者相辅相成，金石学的研究为传拓内容与题材带来了多样性，也培养了宋代文人对于著录、传拓前代石刻的风气；而拓片的制作与传播，为金石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，把刻石变成拓本带进书斋，也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而宋代金石集录、题跋风气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，当属欧阳修。

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号醉翁。欧阳修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较为坎坷，其文学领域相对政治生涯来说，要顺利一些。作为开创金石学的先导人物，欧阳修所撰《集古录跋》收录青铜器和石刻共计400余种，其按照时代次序进行编排，构建了“撮其大要，别为录目”的目录格式，又兼具考证与品赏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综合研究金石学的著作。

除欧阳修外，宋代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金石学家，为传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价值。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撰《金石录》三十卷，共收录金石拓本二千余种，将金石铭文作为补充史料的重要证据对其进行考辨、勘误，完善了金石学体例；洪适所著《隶释》二十七卷、《隶续》二十一卷，将汉代隶书石刻铭文逐篇释读，并加以史实、文字方面的考证，是金石学研究中完善且精细的创作。

宋代除了传拓先秦、秦汉以来的碑刻之外，还进行了古碑的翻刻及重刻工作。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在北宋建隆、乾德间由王彦超重摹于陕西西安，世称“西庙堂碑”。宋代学者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收集、整理、集录、考证，完善了传拓的基础资料，也让拓片收藏的蔚然成风。

宋以后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官方刻帖，即将名家作品双钩摩勒上石，以刻工刊刻，再利用传拓之法，将其上文字椎拓到纸上，成为拓本。其中最著名的，是由宋太宗钦命王著负责编次、摩勒、刻板，并于淳化三年竣工的《淳化阁帖》，共十卷，汇集了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、名家共计102人的420件传世精品。

元明一代，金石学逐渐衰落沉寂，成为衔接宋、清两代的过渡时期。这一时期金石研究的学者主要活动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，金石鉴定理论初步建立，由此推动了私人鉴藏金石风尚的盛行。明代中后期，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统治秩序逐渐失范，人们开始在思想上强调主体的能动精神，尊重心灵的裁判权，一时之间王阳明学说盛行。以此思想为指导，造成了晚明“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的空疏学风，这就导致了清代兴起提倡博学求实、无证不言的考据之学。

由考据金石学而兴起的“碑学”在清代大行其道。清前期碑学的重点是篆隶上的探究，时出现了一批篆隶名家，如朱彝尊（1629-1709）、陈奕禧（1648-1709）、何焯（1661-1722）等，他们逐渐摆脱了唐代隶书的样式，回归汉代，即所谓的“隶书中兴”。至乾嘉时期，才真正在书学上系统地提出南北书派概念和碑学理论框架，以阮元为代表，开启了碑学理论的先声。乾嘉时期的另一标志性人物当属邓石如，虽同为书学秦汉，但其在用笔的铺毫与裹锋、结体的紧密与舒展、气势开张与遒劲等方面作出了总结性探，其楷书更是抛开唐碑，直接取法北朝，具有明显的北碑特点。金石学的复兴与碑派的崛起，使得金石拓片身价倍增，访碑、传拓之风日盛，文人学者争相收藏、赏鉴、考评拓片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善了传拓技艺。

### 3 传拓的当代应用

传拓技艺发展至今，复印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便利，使得传拓技术的适用范围受到束缚，逐渐弱化了传拓的实用价值，更多的保留了其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。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深入，传拓技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开始走入大众视野，也迎来了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型道路。

传拓作品内容的创新。拓片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，自古以来皆有收藏、鉴赏的价值，明以后，拓片收藏之风日盛，其收藏价值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：一是由于保存时间久远，带来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；二则是其传拓内容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价值。现代拓片由于其本身时间积累的限制，并未有历史价值可言，那么创新拓片内容就成为促进传拓技艺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步。在内容设计上，以当代诗歌、现代文学、网络热词等为参考，设计符合当代人精神文化需求的词句；除文字内容，图像类拓片则更容易进行创新与改造，融合现代风格的孔子、财神等人物拓片推出后也广受好评，贴合了当下人们——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追求，金榜题名、财源广进、事事如意、日日欢喜。将传统的中式美学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之中，通过内容题材的个性化、艺术化设计，为拓片作品赋予艺术价值，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更有一些特殊定制与设计，打造拓片的唯一性，使其成为艺术家风格的体现，完成技术手段、文化内涵及艺术审美的高度融合。

传拓技法传播的创新。随着数字化、信息化的不断发展，文化产业融合科技水平，依托现代市场，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当下传拓技艺最普遍的传播方式即为多领域融合，“传拓+博物馆”“传拓+新媒体”“传拓+非遗研学”“传拓+文创设计”等模式层出不穷，通过各领域融合，为传拓技术注入了新鲜血液。2011年，苏州碑刻技艺被批准为“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2012年苏州碑刻博物馆“碑刻技艺展示体验中心”就正式对外开放，成为全国博物馆行业第一家成立的“碑刻技艺展示体验中心”，面向观众进行“碑刻传拓技艺”的互动体验，完成了传拓技艺与博物馆的跨领域融合。有了博物馆的参与，传拓技艺就不仅仅是民间艺术，其精神文化价值被不断挖掘，各类拓片层出不穷，宗教信仰、文人雅士、市民生活等等历

史被生动而又真实地呈现，满足了各个阶层的精神需求，也体现了文化价值的多元性。

传拓传承途径的创新。非遗技艺受限于技术难度高、传播范围小、受众人群少等难题，传承途径一直都较为单一，多以家族或师徒关系世代传承。近年来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受到关注与重视，也提出“人人都是传承人”的概念，希望非遗文化能够走进大众视野，在大众文化中薪火相传。传拓技艺自进入大众视野后，一直致力于传承与保护工作。2013年，苏州碑刻博物馆体验中心正式推出“非遗”进校园系列活动，将传拓体验课程送入校园，植入学生的课程之中。为方便未成年人进行系统的体验课程，课程在传统的传拓技艺基础上进行了拆解与精简，少说多做，反复操作，手把手教学，学生们在一次次的体验过程中，除了了解传拓技艺本身，也能够更加直观地认识书法文字、古典画作等，让学生们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，从而自发主动地去传承非遗传拓技艺。

#### 4 总结

传拓技艺是中国特有的复印之术，也是保存古典文献的有效方式。传拓技艺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化需求应运而生，却也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式微。古代传拓技艺的发展，依托于金石学的研究背景及造纸、印刷术的成熟，在宋代大兴，并完成了由复印到“创作+复印”模式的转变；元明一代的过渡，促进了金石拓片鉴赏之风的盛行，提高了拓片的观赏性与艺术性；再之清代“碑学”的兴起，完成了学术性与艺术性的结合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善了传拓技艺。现代传拓技艺的发展，伴随着科技与文化的日新月异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成为了时代主题，现代拓片在作品内容、传播方式、传承途径等方面都有了继承与创新。保护传承、求新求变，为传拓技艺的现代化道路注入新的生命力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施蛰存.金石丛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
- [2] 马子云.金石传拓技法[M].北京:人民艺术出版社,1988.
- [3] 葛恒新.元明金石学研究[D].山东大学,2023.
- [4] 徐世平.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[D].苏州大学,2020.
- [5] 孙红苑.中西方石刻文献传拓技艺探源[J].美术学报,2023,(04):50-57.
- [6] 王文杰.传拓技术的当代创新应用研究[J].文物鉴定与鉴赏,2022,(17):140-143.